

# 唱国歌的“机闹”仍然是“机闹”

维权意识提高了固然是好事，但是也要防止无理取闹的过度维权。在法治社会，有事说事、有话好好说的维权，比上纲上线扣帽子的纠缠更有效。

## ■评论员观察

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

近日，几段“中国游客大闹曼谷机场”的视频出现在网络上，视频中一些中国游客因航班延误在泰国廊曼机场进行抗议，并高唱国歌。此事引起了很多人的讨论。现在，各地航班延误已经是“家常便饭”，也让很多乘客感到头疼。其中原因有很多，有些是机场或航空公司调度不周造成的，有些是天气或空中管制等不可抗拒因素造成的。无论如何，航班延误对乘客来说都意味着一种损失，他们有权利向机场或航空公司要说法。但是，乘客不能以大闹机场、占机霸机等方式主张权利，而应该依法理

性维权。否则，无论理由有多么冠冕堂皇，形式有多么花哨，都不是“机闹”的升级。

据媒体报道，由曼谷飞往重庆的航班“一波三折”，先是由于天气原因延误三个小时，之后又说飞机需要检修延迟到次日凌晨登机，接到消息后旅客一片哗然。当晚，航空公司安排乘客到酒店休息，而乘客对此产生分歧。一些乘客执意留在机场提出赔偿，并在现场挽手高唱国歌。有人在网上发布现场视频，指责机场工作人员强行驱赶中国乘客，认为对中国游客不尊重就是“不把中国放在眼里”。这样的画面和说法颇具煽动性，也确有个别网友因为这些支离破碎的解读，习惯性地把这个事件理解成了辱华行为。

但是，只要真正了解该事件的始终就能看出，所谓的“辱华”只是

一种错觉。无论是机场还是航空公司都没有公开表示，因为乘客是中国人而有意延误航班。乘客自以为受歧视，而机场方面只认为是无理取闹。类似延误如果发生在国内，比如山东乘客在浦东机场，恐怕也不会有人轻率地拿地域歧视说事。让人难以接受的是，一些乘客竟在机场高唱国歌，想把维权事件政治化。他们可能觉得在异国他乡维权太难，要想让航空公司和机场就范必须借助舆论甚至中国政府的力量。这种观念其实还是停留在“大闹大解决、小闹小解决、不闹不解决”的怪圈里，把普通的航班延误闹成侮辱华人的政治事件，就是最大的“大闹”。中国游客大闹曼谷机场，确实迅速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关注，但是从舆论的反应看，这样的维权实在是得不偿失。多数网友

都认为大闹机场的行为有损国人形象，比起闯红灯和随地吐痰等不文明行为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据说，这些乘客也已被当地旅游部门列入“黑名单”。

乘客大闹机场的逻辑很简单，我是中国人，你没有满足我的要求就是不尊重中国。相信外交和旅游部门绝不会因为个别乘客唱了国歌，就采取超越法律的手段为其撑腰。成熟的“大国心态”离不开自信和包容，如果动辄把经济领域的纠纷上升到国家尊严的层面，与街头“碰瓷”没什么区别了。这个失败的维权创意也从反面警示国民，维权意识提高了固然是好事，但是也要防止无理取闹的过度维权。在法治社会，有事说事、有话好好说的维权，比上纲上线扣帽子的纠缠更有效。

## ■媒体视点

据报道，今年又进入了国家发改委规定的旅游景区3年一调整的“解禁年”。中秋国庆临近，国内一大批4A、5A级景区宣布涨价或即将涨价的消息。

### 设置“涨价周期” 实属制度性缺陷

2007年，国家发改委下发通知，规定旅游景区门票价格调整频次不低于3年，但同时对于景区只要3年不涨价又做出如下“涨价承诺”：门票价格在50元以下的，一次提价幅度不得超过原票价的35%；50元至100元的……2013年出台的《旅游法》则明确了涨价的听证程序，但问题在于，听证会程序往往“逢听必涨”。很显然，只要熬过三年，涨价就有章可循，景区三年不涨价的这点“牺牲”其实非常划得来。某种意义上，正是在这个背景下，中国的5A级景区基本陆陆续续都“按部就班”地进入了“百元时代”。按照当下的政策，我们完全可以大致推算出来景区未来涨价的时间表和涨价幅度，也正是这一政策导致了景区门票价格上涨的“过高过快”。

换句话说，只要景区想在“解禁”年里涨个价，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。所以，当涨价周期一到，“解禁”年又来，控制新一轮的景区价格上涨，似乎就只剩下倡议和号召了。显然，景区价格体系需要重新议定，要有着眼于长远和可持续发展的顶层设计。(摘自《华商报》，作者杨鹏)

### 景区酝酿涨价前 不妨先晒晒账单

旅游景区涨价，给出的原因解释基本上有两种：一种是为抑制增长过快的客流量，另一种就是所谓的为缓解运营成本增加的压力。价格对市场供需有着重大的调节作用，因此我们对第一种解释有时无言可对，可景区拿运营成本来说事，就得拿出令游客心服口服的证据。

国内景区提供的旅游服务，因其特殊性质，可以被视为“准公共物品”，毕竟它与大多数人的生活质量息息相关。口号声声说运营成本增加，那就得公开晒出账单，收入是多少，支出是多少，钱都花在了什么地方，为什么要花这笔钱……确实是运营成本增加造成景区后续维护难以维继，游客也不会不近人情；如果想以“运营成本增加”之名行“恶意涨价大肆敛财”之实，也算是给景区的涨价冲动泼上一瓢凉水。

正大光明地晒出账单还有一个好处，那就是倒逼景区提高服务质量，把每一分钱花在该花的地方。就有一些景区罔顾实际而热衷于引进或开发新项目，造成新项目“水土不服”，最终宣告失败。还有些景区虽然把票价上涨去了，可是服务质量不升反降，频频遭到游客投诉。

所以说，当旅游景区在酝酿涨价的同时晒出自己的账单，接受公众的问询和监督，涨与不涨让游客真正地参与其中，或许游客对于景区涨价的怨言和反感也就涣然冰释了。(摘自红网，作者程传波)

# 脚踏实地就是最好的爱国

## ■大家谈

□徐畅

虽然已过去了几天，相信很多人脑海里还深深地印刻着那场大阅兵的画面。我们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，并以阅兵这种场面恢弘、提振士气的形式来纪念，更多的是在提醒现在的人们对历史做更多的思考，并把由观看、参与阅兵时油然而生的爱国主义情怀，内化为成就个人、服务社会的真正动力。

爱国主义是国民对于祖国忠诚和热爱的态度、立场、情感，是国民愿意为祖国的独立和富强而奋斗的奉献精神。可以说，几乎没有人为自己不爱国，但什么是爱国、应当如何爱国、如何才能爱国等问题，却并不见得是每个人认真思考过的。读史不仅使人明智，读史也使人理智，纪念抗战胜利，温习抗战历史，恰恰可以使我们获得感悟。

爱国需要我们有正确的判断能力和坚定的信念。中国的抗战是弱国抵抗强国侵略的民族战争，这从1937年中日两国力量的对比之中，即可一目了然：1937年日本重工业占57.8%，钢年产量580万吨，经济早已转入战时轨道；中国几乎没有重工业，工业产值仅占全国生产总值的8%，钢年产量仅约4万吨。从表

面上看，中国确实胜算极小，但就像《论持久战》中所说，从战争的性质、国际形势、中日两国国情等各个方面来看，“最后胜利是中国的……抗日战争是持久战。”在这一点上，国共两党主要领导人作出了正确的判断，这成为抗战胜利的重要原因。反观鼓动大家“说老实话”、“要负责任”的汪精卫，不能说他没有一点爱国思想，他之所以成为卖国主义典型，就是因为缺乏正确的判断能力。方向决定道路，道路决定命运，没有正确的判断能力和坚定的信念，可能很难真正爱国、正确爱国。国家政策的决策者如此，普通老百姓亦然。

爱国需要我们践行“有国才有家”的理念。梁启超说中国人只知有“家”而不知道有“国”，孙中山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。的确，近代以前中国人只知道“天下”、“朝廷”，而不知道“国家”、“政权”，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“民族国家”的观念逐渐形成，特别是日本全面侵华，要把中国变成殖民地，把中国人变成亡国奴，这彻底激起了中国人的民族觉醒。正是因为深明这个道理，马本斋才在母亲被日军抓捕，诱逼他投降之时绝不屈服，老人则绝食殉国。也是因为深明这个道理，张自忠才说：“吾一日不死，必尽吾一日杀敌之责；敌一日不去，吾必以忠贞至死而已。”同样是因为这个道理，才有中国各党派、各民族、各阶级、各团体以及海外华侨华人团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。和平年代一般情况不会要求我们毁家纾国、血洒疆场，但是我们只有真正认同这种理念，才能在国家需要的时候做出正确的抉择。

爱国需要我们自强和自立。我们常说“落后就要挨打”，从道德上说这是不对的，因为这是强盗逻辑，是社会达尔文主义。但事实又确实如此。如果我们有强大的国防，发达的工业，日本何以敢轻举妄动，何以敢叫嚣“三个月灭亡中国”，在战场上我们又何以往往仅用血肉之躯对抗日军的飞机大炮？就国家而言，只有自强才能防御外侮，才能震慑外敌使其不敢入侵。就个体而言，也只有自立才能爱国，翻开抗战的历史我们就会明白其中的道理。之所以抗战时期中国有几百万人当伪军，并不完全是因为他们没有爱国意识，也不完全是因为他们贪图享受，原因之一就是大多数普通伪军仅仅是想“混口饭吃”。如果每个人都是自立的人，国家就一定是一个强大的国家；反之，如果连自己都不能养活自己，又拿什么去爱国？某种意义上讲，我们这些生活在当代的人，尤其是年轻人，不应仅仅高喊爱国主义，而是应当脚踏实地做事，成就自己就是服务国家，或者说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个人最大的成功，就是爱国主义最好的实践。(作者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)

# “打坐式午休”夭折，别忙着责怪媒体

## ■公民论坛

□张枫逸

开学伊始，广东佛山南海区狮山树本小学推行“打坐代替午睡”的规定，仅维持了几天就被叫停。南海区教育局基教科科长张鉴华回应称，作为改革尝试，媒体过分关注报道让学校吃不消。(9月6日《南方都市报》)

“打坐式午休”刚推行两天就夭折，真的是“枪打出头鸟”吗？其实不然。如今，人们已经能够以开放和包容的态度看待教育创新，学生、家长、媒体和社会各界并不会循守旧，对学校的创新本能地抵触。只是，教育改革不能胡干蛮干，必须充分尊重教育规律和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，在科学调研论证、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进行。

将“打坐计划”夭折的原因

归咎于媒体，未免有些推卸责任。事实上从一开始，计划背后的双重缺失就已经注定其行之不远。首先是科学民主决策机制的缺失。教育部2012年印发的《全面推进依法治校实施纲要》

明确要求：有关学校重大教育教学改革等决策事项，应当开展合理性、可行性和可控性评估，建立完善职能部门论证、邀请专家咨询、听取教师意见、专业机构或者主管部门测评相结合的风险评估机制。狮山树本小学“打坐式午休”的缘起，仅仅是校长已经练习打坐近20年，觉得效果非常好。推广环节也是由他亲自教学和示范，制作视频在教室播放。

其次是学生和家长话语权的缺失。根据规定，“学校实施直接涉及学生个体利益的活动，一般应由学校或者教师提出建议和选择方案，并做出相应说明，提交家长委员会讨论，由家长自主选择、做出决定。”据家长反映，他们只是在开学前收到了学

校的一个暂停午睡的通知。而“校长通过征求了家长和社会的意见，决定恢复正常午睡”的结果，也从侧面印证了校方完全是“先斩后奏”。

面对记者采访，当地教育局再三强调，“校长也是一片好心。”当然，我们不怀疑学校尝试改革的初衷，也并不希望校方就此循规蹈矩、安于现状，只是希望学校进一步完善重大项目集体决策规则，充分尊重学生和家长的话语权，推进学校决策的科学化、民主化，防止“拍脑袋”、“一言堂”。如今，“确实有家长小孩对打坐感兴趣的，可以向学校申请”，不失为一个理性务实的主意。如果之前能进行评估论证和征求意见，也就不至于走“一刀切”的弯路。“打坐式午休”夭折，值得更多地方教育部门和学校引以为鉴。

■本报投稿信箱：

qilupinglun@sina.com